

»头条时评

美国富豪“豪捐”模式未必适合中国

□杨于泽(湖北)

最近,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号召富豪们捐出至少一半家用于慈善事业,已得到美国40位富豪的响应。两人计划今年9月来中国,明年3月到印度,游说富人捐款。但世界首富、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近日已公开拒绝两人的号召,称其财产必须用于向重要的社会工程投资。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出号召以来,国内舆论通过赞扬美国巨富的“财富观”,向国内富豪做出了道德暗示。中国贫富差距巨大,数千万人还衣食、看病有虞。如果中国富豪跟美国富豪一样热心慈善事业,很多穷人就会成为受益者。

但解决中国的穷困问题,到底是靠慈善,还是靠发展?也许两者

并不矛盾,慈善与发展,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每个人都蒙其利。而富豪捐钱做点善事,也会有人受益,社会就会多些暖色。

问题在于,慈善指向消费,而发展有赖于扩大生产,两者还是存在矛盾。而慈善与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一样。美国是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增长已达极限,发展无求于积累,富豪捐钱无损于经济运行。而在像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财富必须变成要素,投入生产。

假设中国富豪捐出全部私产,整个国家彻底均贫富,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也不过38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是接近4万美元。均贫

富的中国人还是很穷,由此可见,慈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

而发展离不开投资,需要资本,也就离不开富豪的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参与利润分配。财产是私有的,但作为资本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后,私有财产实际上已经社会化了。

回头再看私有财产和慈善,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美国富豪倡导的慈善,实际上是把私有财产抽离生产领域,用于救济穷人,资助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而富豪不捐出私有财产,其财产也不是被富豪消费了,其绝大部分还是在生产领域为社会服务。

就拿墨西哥富豪卡洛斯·斯利姆来说,他现在拥有535亿美元财富,但他没有私人飞机,不喜欢奢侈品,生活开销全部从自己2.4万美元的月薪中支出。他的535亿美元私产,实际上还是被社会占有着,这跟捐了有什么两样?

中国的亿万富豪,大多数跟卡洛斯·斯利姆相似,而跟美国富豪不同。美国富豪,实业家有之,食利者有之。钱不捐出来,未必有利于生产,倒真有可能被奢侈消费掉。中国积累私人财富的时间不过30年,亿万富豪大抵是些实业家,其亿万家财大抵用于生产目的,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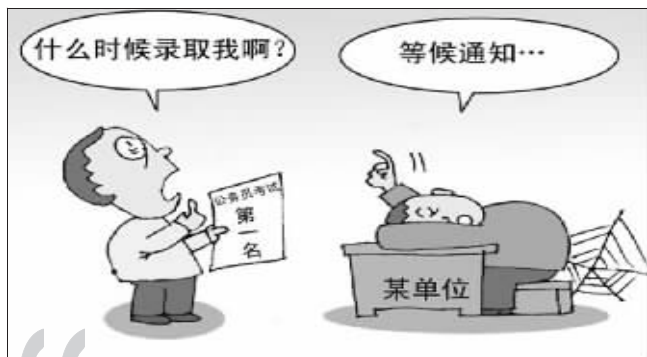
从投资的需要来看,中国富豪不是钱多得要捐出一半,而是资本

积累不足。近几年来,中国已有一批上市民企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盘,民企经营者则走入穷途末路。最近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在资金方面,也不得不寻求“外援”。

美国经济非发展中国家可以同日而语,美国富豪的“活法”也非中国企业家可以效尤。早在190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就宣布“停止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奋斗”,他卖掉公司,全部私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从微软抽身,做全职慈善,也是在他登顶世界财富榜之后。如果中国企业家把财产从生产环节抽出来,不事生产,而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做慈善,那绝非中国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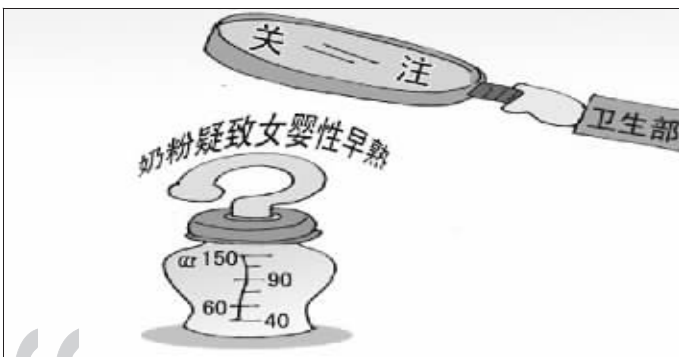
(作者系长江日报文艺评论员)

»画中有话



2009年,胡焯亮报名参加了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胡焯亮顺利通过了报名资格审查,并参加了笔试。经查询,胡焯亮笔试成绩均为第一,但是除了“等候通知”的答复外,他再没有获得任何信息。(8月9日《中国青年报》)

小胡同志的悲哀在于,公考总分第一不代表他的竞争力第一。现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竞争力不是肚子里的墨水,不是电脑键盘上的智慧,而是身后的影子。这影子要么是富要么是贵,如果摊上平头百姓,就没影子了。那个广东东源县法院院长老子招儿子进法院,即关乎影子也。



武汉3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8月8日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卫生部已注意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并已对此事进行关注。(8月9日《新京报》)此事令人费解的是,受害儿童

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遭遇“检测无门”,质检机构“婉言拒绝”,医院称“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而权威部门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工商、质检、医院之间互踢皮球,“有关部门”都变成了“无关部门”。呜呼哀哉! 配文 载边漫画 沈海涛(江苏兴化)

»异论锋生

好一个“贴金术”

□杨光志(四川)

负责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日常运营和检修工作的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日前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8月9日《中华工商时报》)

当灾难祸事发生,常识总告诉我们,从财损上有人要为此买单赔偿,从法规上有人要为此付出刑责代价,从道义上有人要为此良心不安,而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颠覆了这种常识。在中石油这种垄断企业的茶几上,没有杯(悲)具、没有餐(惨)具,他们只有洗(喜)具,他们拥有偷天换日、空帕来宝的魔杖。

他们居然好意思往脸上贴金——公众很生气,中石油很淡定,板子未打先给糖,自弹自唱的表彰既漠视舆论汹汹,也无视国家相关问责法规的尊严,说明了社会正义在某些强势垄断利益集团的阵地失守。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暗示,强势垄断企业捆绑了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棋局,捆绑了国人承受灾难折腾的神经,他们端足了国字号架子,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耻感在哪?一次次撒娇或撒泼的得逞,助长了他的骄横霸道,他们不仅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而且又不担风险地折腾国资,哪怕闯了祸失了火,连稍微糊弄公众的挡箭之盾牌——“反思的花枪”都不屑于玩一把,却大搞起正面表彰,如此悲喜转换,粉饰太平,将一个国家企业的基本伦理与道德血液生生给“污染”了。

韩国的“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焚,乃是一老翁不满拆迁补偿纵火而导致,何以事后竟致韩国政府文化财厅厅长俞弘濬递交辞呈,首尔市长吴世勋向民众公开道歉——对公职官员的问责制,是一种对不当决策或渎职行为很有杀伤力的铁律,这是其独特的耻感政治伦理文化之功。

反观国内,对诸多灾难的事后责任追究惩处,多体现在以做效尤的惩戒上,很少有官员因耻感而惶惶不可终日者。而闹过不罚,闹过反奖,更是颠倒非伦理之最,凸显了垄断企业在中国只需摆平检查组,无需向公众交代的现实。比如7月26日《大连日报》所载《大连海上油污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文,那“背负青天朝下看,百里海区现湛蓝”的诗意欢呼,为此后的表彰造足了声势,为世态增添了滑稽。

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是,让每一个灾难事件必须有具体的人出来担责成为常态,而不是厚颜无耻地躺在事故的功德碑上弹冠相庆。(作者为媒体人)

»主题评论

8月6日上午,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受邀来东莞作报告时,点评了和广东官场有关的腐败人物,诸如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等高官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表示政治明星不洁身自好,乃至腐败堕落,让人痛惜。丘海说,一些因腐败“落马”的高官,几乎都是因为不执行党纪、政纪、法纪,法制意识淡薄和受利益影响,滋生腐败导致“落马”的。“中纪委领导对陈绍基案、王华元案、黄松有案的评价是,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嫖娼。”

丘海说,党员干部嫖娼是一票否决的,高压线,碰不得,一碰即死!(8月9日《广州日报》)

大贪官为何“晚上精神不文明”?

□王石川(北京)

对官员来说,错误并无低级高级之分,只要违法就得被问责,就应该依法受到惩处。如果说嫖娼是低级错误,那么何谓高级错误?包二奶、养小蜜?当然,这则新闻给公众释放的意味并不在此,而是诸如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这样的高级官员皆曾嫖娼,这带给公众的震撼自然非比寻常。

王华元落马前,给人的感觉很正经,俨然很正气。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时,他在做客浙江在线时说:浙江省的广大党员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例外。所谓“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现象。何谓“晚上精神不文明”?不言而喻。谈到包二奶,王华元曾正义凛

然过:作为党员、官员,“包二奶”现象是党组织绝不允许的,有一件查处一件,绝不姑息!王华元还有一件义愤填膺的表演:有人向王华元举报说,省纪委的人受邀和别人去桑拿、搞不正之风,当时王华元气极了,不分青红皂白,边骂边摔手机,手机都被砸烂了,结果“被骂的人,后来心脏不好”。这样的一幕幕场景多么黑色幽默,这样的表演多像演技精湛的影帝!

王华元是建国后省纪委书记落马第一人,但绝不是第一个嫖娼的纪委官员,时任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的杜湘成,因公在北京出差期间嫖娼,结果被警察当场抓住,但态度十分嚣张;今年年初,湖北省

纪委、神华集团纪检组分别对恩施市粮食局和准格尔能源公司几位违法官员通报处理结果。耐人寻味的是,两案主角中竟都有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所做违法勾当都有借出差之机嫖娼。

丘海透露,王华元出事时,很多人都很惊讶。人们不清楚,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严厉的人,怎么也会腐化堕落?其实,任何官员落马前都有预兆,更诡异的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无论陈绍基还是王华元,都是边腐边升。副省级的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其在北京嫖娼时甚至一度被当地警方抓住把柄,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却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官位,甚至依然是“边腐边升”。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一次王华元给人题词,题的就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但在现实中显然并未有效落实。比如,如果不是丘海披露,公众断难知道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都曾嫖娼过。既然党员干部嫖娼是一票否决的,高压线,碰不得,一碰即死!为何王华元的落马不是源于嫖娼,而是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还有多少官员“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这不得而知,但一定有不少官员在台上正义凛然地反腐败,在台下义无反顾地腐败着。阳光的确是最好的防腐剂!但是,要想阳光照进阴暗处,必须掀开遮阳板。(作者系央视评论员)

抵制“三俗”,官员是“草上之风”

□毛建国(江苏)

曾经听过有人为官员叫苦,说现在当官责任重大,工作千头万绪——可谓压力大;有压力还无法排泄,找不到出口——可谓阻力大;身处高位有着各种诱惑,常常让人欲罢不能——可谓引力大。这种分析未必准确,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那就是官员并非“三俗”之风的幸免者。他们有可能甚至有很大的可能陷入低俗的生活之中。从

这意义上说,抵制“三俗”风,官员当带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中国由来就有道德看官场的说,民间语境中,上层的道德好比风,百姓的言行如同草,风吹在草上,草顺着风的方向倒。可以说,官场不抵“三俗”,民间就不可能真正抵制“三俗”;官场“三俗”泛滥,民间“三俗”必然泛滥。

腐败高官嫖娼:“低级”还是“高级”

□张贵峰(湖北)

虽然品位、档次看似“低级”,但就腐败发生、衍生的规律来看,高官“嫖娼”其实一点儿也不低级,实乃其手中权力长期不受约束、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和见证。关于“嫖娼”,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此,仅就腐败的“腐化堕落、品行

败坏”内涵来看,官员嫖娼其实也不仅是低级错误,更是一种甚为恶劣的“高级”错误,实乃其本质“无限的退化”的一种具体表征。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作为丑恶的腐败,其实本无所谓低级高级之分——再低级的腐败也是腐败,绝不能低看不屑,无论低级高级,我们对腐败的态度和立场都只能是“零容忍”。